

加沙人道基金会：一个反乌托邦的杀人机器

在1976年的科幻电影《洛根的逃亡》(Logan's Run)中，改编自威廉·F·诺兰和乔治·克莱顿·约翰逊1967年的小说，一个反乌托邦社会强制执行一种名为“旋转木马”的仪式，30岁以上的公民被要求参加一场公开的盛会，承诺带来新生，却带来死亡。这一机制通过消灭老年人来为年轻人腾出空间，维持社会平衡，掩盖在选择和救赎的幻象之下。在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平行比喻中，2025年2月成立的加沙人道基金会(GHF)，旨在向加沙分发援助，可以被视为现代版的旋转木马——一个以人道主义援助为幌子，将巴勒斯坦人置于致命考验之中的系统，迫使他们为生存进行危险的赌博，同时服务于更广泛的政治和军事目标。本文通过《洛根的逃亡》的视角探讨GHF的运作，比较其援助分配模式与反乌托邦旋转木马的相似之处，突出援助的军事化、受援者的非人化以及其所促成的系统性控制。

救赎的幻象：旋转木马与GHF的承诺

在《洛根的逃亡》中，旋转木马被呈现为一种自愿的再生行为，是公民升入更高存在状态的机会。然而，真相是残酷的：参与者被汽化，他们的死亡确保了剩余人口的资源分配。同样地，得到美国和以色列政府支持的GHF将自己标榜为一条人道主义生命线，声称直接向加沙平民提供援助，绕过哈马斯的干扰。它吹嘘在五周内提供了超过5200万份餐食，将其工作定位为解决以色列封锁后加沙类似饥荒状况的方案。然而，与旋转木马一样，这一承诺隐藏了更黑暗的现实。自2025年5月底开始运作的GHF援助分配系统，被包括乐施会和救助儿童会在内的170多家非政府组织谴责为“不是人道主义回应”，而是一个危及生命的机制。

GHF的模式要求巴勒斯坦人穿越军事化区域，长途跋涉到达少数几个戒备森严的分配点，常常在以色列军队或私人承包商的枪火下。报告显示，超过613名巴勒斯坦人在这些地点寻求援助时被杀，4200多人受伤，幸存者将这些地点称为“死亡陷阱”而非救援中心。这呼应了旋转木马的虚假希望，参与者被新生的前景所诱惑，却面临毁灭。GHF的援助，尽管表面上救命，变成了致命的诱饵，迫使加沙人做出绝望的选择：挨饿或冒死获取稀少的口粮。

军事化与控制：旋转木马的机制

在《洛根的逃亡》中，旋转木马是一个严格控制的盛会，由城市当局精心策划，以维持秩序和顺从。GHF的援助分配同样在严格的军事监督下运作，以色列军队和美国私人安保承包商（如Safe Reach Solutions）负责保护这些地点。这种军事化违反了联合国及大赦国际等组织指出的中立、公正和独立的人道主义核心原则。GHF与控制加沙边境和援助流动的以色列当局的协调，将人道主义援助转变为军事战略的工具，正如旋转木马服务于反乌托邦政权的人口控制。

GHF的集中式分配中心——加沙南部和中部的四个地点——反映了旋转木马单一的受控舞台。这些中心被铁丝网和观察点包围，旨在将巴勒斯坦人压缩到有限的军事化飞地中，便于监控和控制。包括无国界医生在内的批评者将该系统描述为“伪装成援助的屠杀”，在混乱的分配中，数千

人争夺有限的物资，常常导致大规模伤亡。这种设置让人想起旋转木马精心策划的混乱，群众的绝望为盛会提供了燃料，掩盖了系统性暴力。

此外，GHF的运作与以色列的更广泛目标保持一致，一些人道主义团体指责其旨在驱逐巴勒斯坦人。通过将援助限制在加沙南部，迫使北部居民进行危险的旅行，GHF加剧了流离失所，类似于旋转木马通过消除多余人口来维持社会“平衡”。联合国谴责这一模式为“非人化”，指出其无法满足加沙的广泛需求，正如旋转木马将系统稳定性置于个人生命之上。

非人化与绝望：参与者的困境

在《洛根的逃亡》中，旋转木马的参与者被剥夺了人性，在一个将他们的生命视为可牺牲的仪式中被简化为无面实体。同样地，GHF的援助系统非人化巴勒斯坦人，将他们视为威胁而非有尊严的个体。一名前GHF承包商报告了一种文化，卫兵将加沙人称为“僵尸群”，用实弹、震撼弹和胡椒喷雾向人群开火。这种语言和行为呼应了《洛根的逃亡》中执行者的冷漠，他们将旋转木马的参与者视为机器中的齿轮。

GHF的分配过程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非人化。包括妇女、儿童和老人在内的巴勒斯坦人必须步行数英里到达这些地点，却只面临暴力和混乱。一位流离失所的母亲萨玛赫·哈姆丹描述她走了九英里去收集洒落的意大利面，凸显了这一过程的屈辱。就像旋转木马的参与者被迫为生存而表演一样，加沙人被逼迫参与一个有辱人格的盛会，为了一点食物残渣冒着生命危险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·蒂尔克称这一系统“不可饶恕”，强调其通过危及平民违反了国际法。

更广泛的反乌托邦框架：权力与服从

在《洛根的逃亡》中，旋转木马不仅是人口控制的工具，还是政权决定生死的权力的象征。GHF同样作为权力工具，允许以色列及其美国支持者重塑加沙的人道主义景观。通过边缘化UNRWA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成熟的援助机构，GHF破坏了数十年的人道主义基础设施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政治化和军事化的模式。这反映了反乌托邦政权抹杀个体能动性，迫使其服从单一受控系统的做法。

GHF的领导层，包括特朗普顾问、与福音派和亲以色列议程有联系的约翰尼·摩尔牧师等人物，强化了其政治倾向。杰克·伍德因对中立性的担忧而辞职后，摩尔的任命标志着向公开政治化的转变，类似于《洛根的逃亡》中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。GHF的不透明资金和缺乏透明度进一步反映了反乌托邦城市的神秘阴谋，在那里真相被隐藏以维持控制。

结论：拆除现代旋转木马

加沙人道基金会，如同《洛根的逃亡》中的旋转木马，是一个伪装成仁慈的杀人机器，但根植于控制和暴力。其军事化的援助分配系统迫使巴勒斯坦人参与致命的仪式，生存的承诺被死亡的风险所掩盖。通过非人化受援者、集中控制并服务于政治目标，GHF将人道主义援助转变为反乌托邦的盛会，破坏了其声称维护的原则。在170多家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要求其解散之际，与旋转木马的类比凸显了恢复真正人道主义系统的迫切需要，这些系统优先考虑尊严、公正和生命。正

如《洛根的逃亡》的主人公试图逃离他们的压迫系统一样，加沙人民理应拥有一个摆脱这一反乌托邦杀人机器危险的生存之路。